

学习贯彻讲话精神
书写时代新篇章

在与时代同频共振中 锻造文艺精品

□范玉刚

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华民族拉开了伟大复兴的帷幕,中国进入一个新的伟大时代,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被誉为世界史的“中国时刻”。一个文明型崛起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并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主导性力量之一。当今天的中国再次汇聚起世界目光、重新复兴为文明主体的时候,作为当代中国和中国道路的参与者、实践者、记录者、反映者和思想者,当代文艺家不仅有责任让文艺在中国的前行和秩序中成就民族文学经典,更有责任让中国在文化的怀抱和瞩目中迈向世界,助力文明型中国崛起。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问题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激励艺术家在与时代的同频共振中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民族复兴的文艺精品,不断勇攀艺术高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创新文化的能力和水平。因此,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从根本上增强做一个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这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文艺汪洋恣肆纵情挥洒的时代。大时代,文艺要歌颂人民的英雄,与人民的伟大实践同频共振,人民是文艺的“剧中人”。这样的一个时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辉煌的时代,是世界文明史上又一个全面提升人类文明程度的时代。中华民族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无数的英雄,中国文艺也贡献了无数的英雄形象,当代文艺家所塑造的英雄人物更是丰富了文艺人物画廊,这些英雄人物无论是军人、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无不肩负着时代的使命,昂扬着民族的精神。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文艺要同时代同频共振。作为时代的产物,文艺随着民族兴衰、国运沉浮,其发展愈益受到时代的深刻影响。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真正把人民作为文艺的主人公,才能切合时代的鼓点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人民火热的生活是文艺创作最广阔也最深厚的时代舞台。当今中国,正处在大踏步赶上现代化潮流并站在世界发展前列的历史时期,正处于为人类文明进步做重要贡献的伟大时代。这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素材,有最能体现中国人民创造智慧和文化精神的中国元素,有无数体现时代精神的人民英雄、感动时代的人物。忠实记录、深刻反映、艺术再现这个恢弘时代的巨大变迁,为人民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积极反映人民的心声,在融入人民火热生活中,塑造一系列无愧于时代的英雄群像,成为时代的洪钟大吕。文艺实践表明,惟有表现人民伟大历史实践的作品才能张扬时代精神,使文艺发挥最大的正能量,进而与时代同频共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就是在根本上书写和记录亿万人民实践的文艺。艺术离不开人民,真正的文艺精品、艺术经典之作,无不与时代和人民息息相关,象牙塔里出不了文艺精品。只有真正扎根人民生活,文艺才能真正生动活泼起来,回顾文艺史上那些彪炳千秋的文艺经典,无不闪耀着人民性的光辉,传达着人民的情感,在根本上反映着人民的心声。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文艺家心里装着人民,用积极的文艺歌颂人民,把人民作为文艺的主人公;勇于创新创造,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在根本上彰显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本位论。他明确反对那种“以为人民不懂得文艺,以为大众是‘下里巴人’,以为面向群众创作不上档次”的观点。在平凡

的时代,艺术家只有写出作为“剧中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以及为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的努力,才能达到与时代同频共振。事实上,艺术只有通俗易懂、接地气,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在不断创新中贴合时代需求,切近不断变化的审美风尚,被人民群众所广泛接受,才能抓住时代。只有融入人民火热的生活,艺术才会自觉地表达和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和意志、愿望和呼声,在精品创作中生长出创造性的力量和文化自信的根基,在价值引导中肩负起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使命。

如何抓住时代?大作家歌德强调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性,有对时代的深刻思考和艺术追求。因而,真正的艺术家不是时代和市场的应声虫,不尾随时代的潮流,追随时潮,更不会充当时代风尚的爬虫,而应当引导时代潮流。真正的艺术家不能也不会附和读者或观众的欲求,成为感官欲望和市场的奴隶,其使命是通过作品使读者或观众提高思想境界和审美品位,以艺术精品抵御“三俗”之风蔓延。当前,为了抓住时代,文艺家在采风中已融入人民的生活。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指引下,文艺创作之风焕然一新,文艺界采风创作、深入生活火热展开,在深切感知人民生活的“热度”中,文艺作品有了“温度”,文艺风气不断纯净,文艺呈现新气象新局面。2015年全国营业性演出总场次达到2110万场,比上年增长21%;观众达到9.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5.3%;演出收入94亿元,比上年增长24%。可以说,文艺生产正在满足人民多样化文化的需求。就文艺发展规律而言,艺术创作固然是个体性的审美创造,但“个我”绝非是封闭性的与人民的生活和情感相隔绝。“个我”是人民生活的窗口和时代精神的聚焦,是融入人民生活的艺术创造者,文艺审美的真正创造主体是大写的“人民”和民族深层次的精神追求。究其根本性而言,人民性不仅是艺术表现问题,还是一个文艺家创作立场问题。虽然人民有广大性,但要真正实现文学的人民性,就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把人民作为文艺的“剧中人”,积极反映人民的心声,塑造人民形象。

文艺与时代同频共振,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艺术家只有眼睛向下,对多彩的现实生活有丰富的积累、深切的体验,领悟生活的本质、吃透生活的底蕴,才能创造出深刻的情节和动人形象,其作品才能激荡人心。作家的根不在舞台上,而在民众中,作家要深入生活,在寂寞的长期坚守中“十年磨一剑”,而不是频繁地亮相媒体。“作家离地面越近,离泥土越近,离百姓越近,他的创作就越容易找到力量的源泉。世间万象,纷繁驳杂,尤其是我们身处的时代,丰富性、复杂性超越既往,作家怎么选择,目光投向哪里,志趣寄托在哪里,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了作家的品位和作品的质地。”只有把心沉在人民中、沉在文学里,创作接地气,作品才能是独特的,才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

文艺要与时代同频共振,文艺家就要做自己时代最敏锐的发现者和感知者,同时要千方百计地寻找与时代相契合的话语和艺术表达方式,以艺术精品高扬时代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伟大的作品都有着强烈的时代性,只能产生在它们所处的时代,就在于它们反映了时代的现实,抓住了时代的问题,问题源自人民的生活。文艺热爱人民,不仅要在融入火热生活中反映人民的心声,更要基于人民性立场为人民抒情,抒写人民的追求和战胜困难的希望,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和光明,以向善向上的价值引领社会风尚。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

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是人民的文艺,文艺热爱人民,靠的是优秀作品及其主流社会价值诉求,表现为基于人民立场对社会道义的弘扬和道德理想的守护。作为时代的表征,伟大的时代呼唤无愧于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文艺创作的活力和激情源自对人民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真正懂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我国久传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文艺与时代同频共振就要俯下身,向大众敞开自己,这不但有利于激发文艺创造的活力,还有利于在全社会建构保护文艺发展的社会氛围和机制,使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发展的重要力量,使所有参与者都能在文艺活动中获得满足感和幸福感。

文艺与时代同频共振,要坚持“人民是艺术作品的评判者”的批评原则。把人民视为文艺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既是对当前文艺发展的期望,对当代艺术不断勇攀高峰的期许,是对人民艺术家不断创作艺术精品的期待,更是在根本上保障文艺与时代同频共振。在全球化竞争舞台上,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平等。在文化思潮的激荡中,唯有文艺精品能够在全球文艺舞台上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参与文化交流和竞争,文艺精品的不断涌现是一个时代文艺繁荣发展的表征,它体现了一个国家文化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一个国家民族文艺经典化的程度。古往今来,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受到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文艺精品和文艺巨匠的深刻影响。当下,我们越来越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拐点,亟需创作出更多与时代同频共振、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使当代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界舞台,展现一个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新形象。

历史上,中华民族以唐诗宋词享誉世界,这种盛唐气象彰显了时代精神、时代底蕴,是文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显现,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中国文学所达到的高度,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高度,也是当时世界文明的高度。今天,中国文艺需要重新起航,以更加辉煌的成就走向世界,与世界各国文艺同台竞技。歌德在抓住时代中提出“世界文学”的命题,意在激励德国作家推动德语文学(民族文学)的经典化。对于迈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只有实现民族文学的再次经典化,有了一系列现代文艺经典作品,才有资格谈论“世界文学”,才能从根本上扬弃“西方中心论”,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今天,中国文艺家要有此自觉——民族文学的经典化。使中国当代文艺、当代文化成为世界全球化舞台上发挥影响力的主要文化之一,成为世界主流文艺、主流文化之一。与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何时出现,已成为整个文艺界乃至整个民族的期盼和焦虑。一个民族的文学经典,是该民族的精神史诗,记录着该民族的心灵和情感,标识了共同的审美追寻和价值认同。不能寄望于外在的扶持和打造,精品的涌现和经典的生成是内在的自觉,是艺术家主体意识自觉下的自然而然,是艺术家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艺术追求。经典文艺所透视的真实性绝不是对社会生活简单的摹写和反映,而是在紧紧抓住时代,对生活现实高度提纯后,融入对时代本质的深邃洞见;经典文艺所诉求的艺术性,是文艺家追求艺术卓越性,高扬审美理想和人文价值的自觉;经典文艺所蕴含的善,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切关切,是对境界的价值祈向。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很是特别,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都一直在遭受各种质疑。追根究底是因为当代文学研究,与我们所熟知的传统的“做学问”方式不太一样。

只是,当代文学已经60多岁了,而现代文学不过30年。当代文学在60多年所经历的一切,较之以前几十年,只多不少。是时候了,学科的发展已经到了和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一样运用文献史料方法进行研究的时机了。

事实也是如此,近几年来,可以看到,当代文学研究正在迅速地转型。史料实证代替理论阐释成为学界的一个新的现象。同时也出现了不少学术论文专门讨论史料学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意义与作用,用史料学方法申报课题也在不断增加。

在这样的背景下,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以下简称《史料问题研究》)一书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当代文学史料的论著,一方面是水到渠成,应运而生,另一方面也是得风气之先的开拓性成果。

需要说明,这不是一本史料汇集,而是一本讨论当代文学史料学的理论书籍,立意深远,结构宏大。它确立了当代文学史料学作为一个学科分支的地位,梳理了这一学科分支的发生、发展及现状,把当代文学史料进行了分类,并对每个门类进行了阐述,分别论述了它们各自的内容、特征,值得注意的问题。最后,它还就当代文学史料学研究本身中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很深入的剖析。

《史料问题研究》除绪论外,分上下编。虽然绪论在总共582页的书中仅占28页,但它的的重要性足以使它单独成为一个部分。在这里,它完整地梳理了史料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由被忽视而渐入主流的过程,将其与古典文学及现代文学的史料工作贯通起来进行审视。最重要的是,绪论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搭建起了一个纵横交错、史论结合的学术平台,从当代文学史料的本体分类及其特征,直至史料与思想的关系,都一一做出了论述。从绪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论者的视角并不在于微观的史料工作,其关注点也不是简单的史料研究的方法论或

是罗列材料,而是从整体宏观大视野的角度观照当代文学史料,“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勾勒形态谱系,并且厘清它与周边的关系。上下编之间虚实相间、互相呼应,有着深化、补充和拓展的递进关系。上编主要对当代文学史料进行分类,下编在此基础上进而就有关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史料问题研究》基本上涵盖了当代文学史料的方方面面,在史料的形态上几乎没有遗漏,可以说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当代文学史料体系。特别有意思的是,从此书有关史料分类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文学史料学是怎样在研究过程中逐渐生成发展的。它虽然借鉴古代和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方法,但绝不是简单照搬,而是基于史料存在的实际和研究工作的需要,一步一步趟出自己的路子,有着鲜明的特色。即便与以前的史料学方法有相似之处,也是不约而同,殊途同归。书中所涉及的史料,包括了大量的政策文件、会议纪要和社论,还把口述实录也及时引入了,甚至还有电子文档和网络记录这样前所未有的史料形式。

不仅分类上有鲜明的学科特色,在论述中更是如此。当代文学研究与其他文学研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与政治的难分彼此。虽然这本书探讨的是看似中立客观的史料学,可那是当代文学史料,它对所有史料的范围规定和问题讨论,都无法脱离意识形态而单独存在。因此书中也使用了大量的篇幅试图厘清意识形态对史料的联系、介入与影响,几乎每一个章节都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这完全符合当代文学实际,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当代文学的特殊所在,失去了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也就失去了该学科的特性和张力。不过,因为该书的体例设置是上编按类别讨论,下编按问题讨论,而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却很难按类别和问题区分清楚,但又不得不在每一个部分和问题里都讲到。因此从全书来看,这方面的论述常有重复。考虑到此书是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的成果,是由一人主编而不少人同时编撰的,亦可理解。

《史料问题研究》体现了著者对于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学术构想,可以说建构了这一学科分支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有筚路蓝缕之功。不仅如此,书中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当代文学及其史料学中最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当代文学研究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为我们打开了遮蔽已久的新领域。由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它将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界碑之一。



打开了遮蔽已久的研究领域

□ 郑
绩



文学批评何为

文学批评如何创新创造的问题,是张炯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认为,文学批评要结合中国当前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系列重要讲话,是对于新时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文艺实践的总结,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实践的结合,是一个里程碑。同时,我们要尊重中国古代文论的优秀传统,有些成体系的,像《文心雕龙》,也有些不成体系,像一些诗话、词话,其中有很多精辟的观点。对它们的继承既要跟中国的文艺实践结合,还得进一步地整理和批判,吸收回到我们的文艺实践中。

张炯认为,文学批评学术性比较强,批评水平要提高,同批评家的思想高度、艺术鉴赏高度、学术视野的宽度密切相关。他说:“上世纪60年代初,周扬先生曾经找我们几个年轻同志谈话,说他们这一代人读书不如鲁迅、郭沫若多。因为要搞革命,没时间读书。‘你们这一代现在有时间读书要多读书,这样才能从你们中间产生大的学者。’可惜谈话之后我们下农村,只能通过广闻博见来提高自己的水平。所以,新一代的批评家要想在文学批评上有所创新,必须坚持不懈地开拓视野。”

“我们的民族有着旺盛的文化创造力。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就建立在对文化传统的认识上。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怎么样坚持文化自信,值得不断思索。”张炯提到,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对国内的文

学创作成就不自信,对文学走出去的自信也不是太足。但是,只要作家们用本民族的语言去描写本民族的生活,创造本民族的风格,真正创作出真善美的作品,那么世界各国的读者就会承认你。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一味学西方的东西,人家会觉得自己就有,不觉得新鲜。他尊重的恰好是属于你本民族的东西,因为它们可以丰富世界文学。这一点中国作家完全可以做到。莫言笔下的高密、贾平凹笔下的商州、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张炜笔下的山东、李佩甫笔下的河南,都很有特色,他们的作品都可以翻译到国外去。所以中国作家应该感到自信,中国文学已经走向世界,还会继续走向世界。

对于新媒体批评、非虚构写作、网络文学等相对比较新的文学现象,张炯借用刘勰的话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但是,文学属于审美意识形态,它的本质没有变,是为了满足人民的审美需要才创造出来的。通过作品,人们能够更好认识现实生活,能够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能够从中得到审美的愉悦。对于这些新的文学现象,要用同样的尺度去衡量,具体作品具体分析。比如,有些作品很难说是虚构或是非虚构,像《三国演义》就是七实三虚,关键不在于它是虚构还是非虚构,而在于它是不是文学。网络文学的数量非常庞大,良莠不齐,但其中毕竟产生了一些优秀的作品。这也需要我们新一代的批评家去仔细甄别。

(丛子钰)

胡真才同志

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西葡拉美文学研究分会副会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编审胡真才同志,于2017年4月14日在京去世,享年67岁。

胡真才,中共党员。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著有长篇小说《中奖彩票》《寒水岭匪帮》(合译),戏剧剧本《维加戏剧选》(合译)和《回归本源——加西亚·马尔克斯传》(合译)等。所编图书《塞万提斯全集》《荷马史诗》分获第三、四届国家图书奖。